

余姚罗江：运河明珠 人文名港



罗江，原称芦江，位于余姚市河姆渡镇，东接江北区慈城镇，其东南隅斜卧着芦山，其余均被姚江（前江）、慈江（后江）及其支流环抱。

罗江有三含义：原罗江乡，面积14平方公里；古代罗、任、刘三大姓聚居的仅半平方公里左右的罗江自然村；面积6平方公里的罗江行政村。罗江历史上先后属句章县、慈溪县，有“句章旧地文献邑邦，芦江古邨东南佳景”的美称。



姚江罗江段

罗明

历史灿烂。2003年10月，在时任省委书记习近平的陪同下，江泽民同志参观了河姆渡遗址博物馆，并为河姆渡遗址博物馆题写馆名。距今七千年前的河姆渡文化遗址，位于毗连罗江的姚江右侧，是我国南方新石器时代考古的重要代表。那时的河姆渡人，住在榀卯结构的干栏式建筑，利用骨制石制工具，采集狩猎，种水稻，养家畜，有玉器、骨哨乐器、纤维编织物和象牙刻制品等。其中“双鸟朝阳”的纹样雕刻，画面布局严谨，线条虚实结合，寓意着对鸟和太阳的崇拜。还有同处河姆渡文化时期的下庄等四遗址，反映了这一区域史前的繁荣景象。

两帝诰封。唐末罗甫，21岁中进士，原配夫人为唐武宗外孙女，岳父是驸马状元郑颢，官至兵部尚书。后辞职隐居于睦州桐庐新登（今杭州富阳区）。公元880年，悉黄巢率军占睦州，于是率家族成员，沿浙东运河，乘船到芦江。历经艰辛，疏浚围垦，修路架桥，终成新家园，渐成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运河商埠，渔樵耕读、文化传承的江南水乡。

后人感恩。建罗公祠，以供纪念。1130年，宋高宗诰封罗甫“嘉德侯”，并亲书“嘉德庙”额，从此称嘉德庙。1361年，元顺帝又封罗甫“嘉德顺惠侯”。在《清康熙宁波府志》介绍各县台祠庙篇章中，其中慈溪有68个祠庙，大多二三十个字，而介绍嘉德庙的达



芦山寺（图片由作者提供）

461个字，居首位。在全宁波府域介绍中，嘉德庙的篇幅位居第三。可见，罗甫及其后代有较高的历史地位和现实影响。如今的罗江罗氏，散居各地，今宁波市域和上虞嵊州境内的罗姓者，多系罗甫后裔。

六十进士。罗江罗氏理学治家，家训教诲，族规约束，运用族田义塾等方式，安抚当地人，滋润后来者。参与科举考试的，始于唐宋，集中于五代、宋代和明代，在元代，与官府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无人参考；在清代，坚守反清复明的信念，合作的也是少数。据不完全统计，罗江考中进士的有六十多人，其中罗氏有五十四名。罗甫子罗伏，唐末（899年）进士，曾任吴越国丞相。宋时罗江罗氏已是“四明望族”，北宋罗遂中进士，其五个儿子是举人，孙辈中有十八个举人，其中六人中进士。

宋时慈溪著名的“五先生”，罗江占二席，即无闲先生刘继宽、罗江先生罗仲舒（进士）。南宋刘厚南中进士，官至刑部尚书。明代罗信佳和罗缙父子先后中进士，分别官至明兵部主事、广东按察副使，旧时慈城建有“父子进士坊”。除科举仕途外，还有不少佼佼者，如明代罗廉，出生在官宦世家，轻科举，重实学，专茶事，他写的《茶解》，仅次于唐代陆羽的《茶经》，开启了明清时代茶文化的新历程。

近代叶月贞，时称“刘家姆嬷”，才智过人。她周旋于和平军、国民党、日本人、土匪武装和

乡贤土豪间，求得罗江平安，救下了多名共产党干部，是“浙东阿庆嫂”，得到了何克希、陈伟达等的佳评。

海归办学。早在宋代，罗江已有私塾，还是义塾，一般由族内官宦乡贤倡议并出资，捐献或者购买田地作为义田，所得田租作为办学经费。罗仲舒的《义塾书灯》“夜深展书读，伊吾声比屋。掩映杖头光，穿破西园竹”，也予以印证。罗仲舒还在罗江吊桥前创建了“经训斋”藏书楼，供当地人阅读交流，开浙东地区的先河。经训，经籍礼理的解释；斋，耕稼为民生之本，比喻事物的根本；经训斋，意为明事寻律，耕读并举。

清末罗江罗诗怀，于1897年“置田千余亩，租息所入给族内孤寡废疾，并设学塾以教邻里子弟”。其子罗翔，毕业于日本大学法律专业，在1910年归国，在罗江罗氏义学旧址创办继志初等小学堂，使用商务印书馆编印的新学教材，自任校长，兼义庄庄主，先后受到徐世昌和黎元洪两任民国大总统嘉奖。1929年，由钱祥桐和罗振泉发起，罗江罗氏和浪墅钱氏合办“私立芦墅小学”，以罗江岳殿附房为校址，为当年罗江的第二家初级小学，还有校歌，供师生同唱共勉。尊师重教代代传，1993年，原罗江中学教师罗江人徐文通，被国家教委授予全国优秀教师称号。

运河商埠。前后江呈东西向，沟通宁波与丈亭、余姚，位居罗江南北，原是通海的潮汐河，进出潮流有时间差、方向相反的特点，而大泾浦西罗浦呈南北向，连接两江，“后江涨潮前江落，南岸帆开北岸收”。罗江人利用之，发展水运和商业。当地粮油及其制品、四明山货、三北（今慈溪）棉花及其制品、舟山海鲜等，在罗江市互通有无。宋代罗江就称“慈南名乡”，明清时期罗江市为慈溪“南乡六市”之一。近代有新业态、新天地，当时“慈溪四恒”，在北京小有名气，其中恒利字号下的钱



嘉德庙东门

庄、银楼、绸庄和典当行，就是罗江人所创；罗江罗松乔，依托罗江市，经营与上海市的信件传递、物资递送、金钱护送、劳务派遣等，其“信客”生意兴隆。

千年古刹。芦山寺位于芦山北麓，始建于758年，曾与天童寺、雪窦寺齐名。原人寺大路两侧皆为松树林，寺前更是古松苍劲、翠柏挺拔、银杏参天，气势恢宏。原寺中挂着“十里长松覆古寺，万竿翠竹卫山门”“香风自径人空起，花雨从天落”的楹联，北宋王安石到此写对联“二十里松行欲尽，青山捧出梵王宫”，曾挂在大殿里；宋代舒亶也咏出“别开小径人松关，半在云间半雨间”（《芦山寺》），此番美景延续至上世纪中叶。今寺前，有一株千年银杏，围须三人环抱，是原景观的见证者。南宋诗人陆游到芦山寺写下了《寄芦山寺僧元衡》等诗。在芦山寺生活过的高僧大师，历代都有，近代的有天台宗第四十三世传人谛闲法师（1858年—1932年），闭关学习三年，专修天台教规。现代有妙善大师（1909年—2000年）和悟道法师（1921年—2005年），前者曾任省佛教协会会长、普陀山全山住持，并成为临济宗第四十七世传人，后者曾任绍兴市佛教协会会长、新昌大佛寺住持，并成为净土宗第十四世传人，俩人都在此居住了廿年。

拥抱双城。当代罗江，政府规划，民众努力，建成了镇工业功能区，228国道连接甬姚，各有两路公交车交接相会，直通两市区。由于环境好，一些投资者、经营者及企业骨干工作在罗江，生活在甬城，两地相距不到二十分钟车程，成为城郊型制造业基地。

文明的力量在细节

世象管见

吴启钱

无论人类学家或社会学家如何定义，在笔者看来，所谓的文明就是对人的尊重与关爱。文明的力量在细节。

有人问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您认为人类文明最初的标志是什么？”玛格丽特给出的答案是：“一个愈合的股骨。”在远古时期，如果有人断了股骨，除非得到别人的帮助，否则就不能打猎、捕鱼或逃避野兽的伤害。因此，发现一个愈合的股骨，表明有人将受伤的人带到了安全的地方，并且花了很长时间来照顾他——处理伤口、提供食物、保护他不受攻击，让他慢慢康复。

如果说，对他人的怜悯与同情是文明的起点，那么文明的进步则体现在对他人的尊重与呵护，让所有人在这个世界上感到安全、便利、舒适和友爱。所谓文明，就是对人的善待。创建文明城市、文明单位、文明社区，就是通过一系列行动，让人感受到善待。需要响亮的口号，更需要一个个具体行动；需要形象装点，更需要人性满足；需要“宏大叙事”，更需要一个个细节体现。细节在文明创建过程中，正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会表现出强大的力量。

在细节中见证文明的力量。十字路口，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之间增设了柔性分隔桩，右转的机动车减少了因视野盲区与人碰撞的风险，直行的非机动车多了一份安全；小区垃圾桶旁，新装了水龙头，厨余垃圾万一带袋，有了洗手的地方；鄞州区矛盾纠纷调解中心，工作人员车辆全部停放到五百多米外的鄞州公园地下停车场，腾出车位给办事群众；某小区有住户在顶楼阳台违法搭建“阳光房”，

城管队员接到举报后不到十分钟就到达现场，避免了一触即发的邻里纠纷，防止了“生米煮成熟饭”后的执法尴尬；公交车站，曾经高居在细杆顶端的小站牌，越来越多被设计成与人等高的大屏……

类似的细节还有很多。在细节的持续改进中，我们体验到了更多的便利与舒适，尊重和关爱。正是这些细节，标志着城市的进步，彰显了文明的力量。这正是文明城市创建之所以吸引千万人参与、活动如火如荼、热情持久不衰的动力，也是争创全国文明城市“六连冠”成为上下共识、万众期待的原因。

文明体现在细节，不文明的软肋，也在细节。某公园小桥上可通行自行车，但桥头却有两级十多厘米高的陡峭台阶，无论自行车、轮椅、婴儿车还是童车，论了桥头只能望而却步；某商业广场在每个进出口都设置了障碍物，阻止非机动车进入，却把行人通道也一并堵上了，结果通道边上的绿地被穿行者踩出一条条“小路”；一条新翻修道路，柏油非机动车道与砖石人行道之间，新设置了整齐美观的分隔铁栅栏，却在“忘记”在过街人行横道的两边给人留个口子，让人不得不“跨栏”进入人行道；街头巷尾的标语或牌上的语言文字错误，尽管不是比比皆是，但也经常出现，误导刚识字的孩子……

这些细节问题，或因设计制作者的粗心大意，或因责任部门的条块分割导致各唱各调，或因完成某个任务而顾此失彼，其共同之处都是“眼里没人”，忽视了市民对安全、便利、舒适细节的需要，削弱了文明的力量。

细节决定成败。我们对被善待、被尊重、被关爱的要求没有止境，对文明的追求就不可能止步，在细节的改进与完善上，便也没有休止符。精细化不仅要体现在城市的建设与管理中，更要落在文明创建的方方面面。这样，文明才具有持久而强大的力量。

漫画角



加餐

蒋跃新 绘



能上不能下

鲁楠 绘



选择

盖桂保 绘

辩证地认识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

新知

李君如

把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放在第一位，是中国这次抗疫成功的重要经验。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者武装起来的，懂得社会发展的规律，懂得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在研究人权思想时，也必须辩证地认识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

当我们讲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的时候，这里的“人”既是单数的人，也是复数的人。我们既要尊重和个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也要尊重和保护他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由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人民

的一员，尊重和保护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也就是尊重和保护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同时，每一个个人又都有义务尊重和保护他人和全体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在一定的条件下，个人还要准备奉献自己的自由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去救治和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权和健康权。为什么我们把这次驰援武汉的军地医务人员称为“最美逆行者”？就是因为他们在武汉封城后还要冒着有可能被病毒感染的风险逆行在去武汉的征途上。事实上，不仅驰援武汉、湖北的军地医务人员是“最美逆行者”，武汉、湖北当地的医务人员和全国各地战斗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第一线的医务人员都是“最美逆行者”。因为，他们天天和新冠病毒短距离

接触，天天冒着被病毒夺去生命的危险。

同样的道理，对于这些“最美逆行者”的生命权和健康权，我们要格外尊重和保护。他们为了救治患者，准备牺牲自己，但我们不能让他牺牲。在整个抗疫过程中，我们都怀着对他们十分敬重的心情祝他们能够平平安安。很多地方党委非常关心这些“最美逆行者”，并做了大量工作。既千方百计保护患者的生命权和健康权，又千方百计保护救治者的生命权和健康权，这就是我们所理解的全面的生命权和健康权——人民的生命权和健康权。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有人为了大我而牺牲小我，也有人贪生怕死、苟且偷安，甚至在外敌

入侵时为保全自己的生命而甘当臭名昭著的汉奸。我们决不允许任何人用懦夫的行为、汉奸的罪行等来玷污“尊重和保护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这一崇高的人权思想。我们在这里讨论如何理解个人在对待生命权和健康权问题上的正确立场，就是不能只强调个人而不顾及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权和健康权。

综上所述，对于“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一定要辩证地加以理解，正确认识“个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同“人民的生命权和健康权”之间的辩证关系，决不能用个人主义价值观曲解“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

（作者为中央党校原副校长）
来源：北京日报